



读

中

国

孔范今 主编  
泰山出版社



五卷

# 前言

“古老的东方有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

在这个古老而又朝气勃发的国度里，华夏民族曾经有过令世界震颤的纵横捭阖的辉煌，宏大的汉唐气象仍使我们振奋不已；也有过诸多的迂回曲折，步履艰难的足音仍清晰可闻；当然，还有过至今思之尚有余恸的濒临沦亡的苦难，警钟的鸣响也依然余音在耳。正是在这样一个生存发展的过程里，华夏民族以自己独特的智慧和力量，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历史时空，创造了彪炳于世的中华文明。作为我们民族生息发展的血脉之根，它不仅催生过灿

烂的历史之花，而且也是我们面向新世纪的历史激情的来源。

邓小平同志生前的光辉业绩之一，就是适时而科学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在洞察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针对中国的现实条件所进行的最富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科学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色既来自特色的现实，也来自特色的历  
史和精神文化传统，因为现实必定是历史的发展。因此，要使人民群众对这一特色理论有较深刻的理解，就必须使之认识中国势在必然地发展到今天，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特殊规定性里边运动发展的。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邓小平同志的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又旗帜鲜明地作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在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要搞好这一建设，也必须使人们了解我们历史、文化传统的特色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今天的中国人，必须在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有特色的发展中真正地或者说进一步地认识和了解中国。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亟欲了解中国。而在长期非平等对话中，国外对中国的宣传又存在着严重的偏误，甚至是别

有用心的丑化，所以极少有正确反映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反映其独特规定性发展的读本供他们阅读。如何让外国人正确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了解我们华夏民族历史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也是我们必须予以重视的迫切问题。

而这一切，就正是我们编注这部《读中国》的目的所在。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你要了解中国是在哪些重要文献的影响和规约中发展到今天的吗？你要懂得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是在什么样的规定性中形成和发展的吗？你要在独特的历史、文化基础上更深入地了解和懂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吗？那么，请你看《读中国》。

《读中国》，这是一部有助于国内外读者认识中国的经典性文献选本。与那些着眼于文章体式或某一专项需求的“选本”、“类编”不同，它以历史的流程为经，以共同参与创造并规约着历史、文化发展的文献作品为纬，精选了在不同历史阶段特别是重要转型时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哲学、文学等方面的代表之作，在综合性的意义上，这些曾经感动过中华民族、推动过历史进程的要论华章，将简捷明了地显示出中国历史、文化生存发展的特色性内涵和独特规约。

书已编出，但愿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

# 卷首语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后，毛泽东写下的两句诗。大约没有什么词句，比它更能恰当地概括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变化和精神风貌了。

20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政治、文化、经济的前无古人的深刻变革，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巨变中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人的解放，革命的潮涌迭相奔突，其声若黄钟大吕，其势如长江大河，激浊扬清，振聋发聩。深刻的民族自省，诚笃的广纳博取，使古老的中国文明在宏阔的世界眼光中重新被审视、改造和

提升，在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焕发出新的光华，并日渐展示出中国智慧的巨大魅力。

这一切，都是在寻找到马克思主义并把它置放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里加以发展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产物，更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精神明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历史发展必然选择的最准确而深刻的洞察与思想建构，它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不仅将中华民族引导到了令人自豪的历史新时期，而且还将继续引导着人们雄步迈进下一世纪！

# 目 录

前 言	一
卷首语	一
章太炎	一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节选)	一
邹容	二二二
革命军(节选)	二二二
秋瑾	
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	
林觉民	
与妻书	三一
孙中山	
《民报》发刊词	三五
陈独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三八
鲁 迅	
敬告青年	五四
狂人日记	六〇
阿Q正传	六九
记念刘和珍君	一〇三
凤凰涅槃	一〇八

郁达夫	春风沉醉的晚上	一一八
闻一多	发现	一三二
	一句话	一三三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一三四
	实践论	一七五
	矛盾论	一八八
刘少奇	纪念白求恩	二二一
周恩来	为人民服务	二二二
	愚公移山	二三四
朱德	沁园春·长沙	二二六
陈毅	七律·长征	二二七
方志敏	沁园春·雪	二二八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节选)	二三一
梅岭三章	大江歌罢掉头东	二三八
赠友人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二三九
二四一	太行春感	二四〇
二四二		
二四三		
二四四		

茅 盾

林家铺子 二六二

多收了三五斗 二九九

叶圣陶

三〇八

老 舍

黑白李

三一三

艾 青

大堰河——我的保姆

三二二

光未然

黄河大合唱

三二一八

雷 锋

雷锋日记（选十七则）

三四五

邓 小 平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三五一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

式的讲话 三五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三六六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三七八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

大会上的祝词 四〇一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四〇七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一〇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四一四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

等地的谈话要点 四一八

## 章太炎（1869—1936）

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甲午战争后加入强学会，宣传变法维新。戊戌政变后遭通缉，逃往海外。1899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同年回上海，立志革命。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判保皇派改良主义理论。因“苏报案”被捕。1904年冬在狱中参与组织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赴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民报》，批评改良派，1910年与陶成章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部，任会长。武昌起义后，拥戴黎元洪。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秘书长。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以讲学为业。1936年病死于苏州。他是近代著名学者，对文史有精深研究。著述有《章氏丛书》、《太炎最近文录》等。

###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节选）

长素足下<sup>①</sup>：读《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万言。呜呼，长素何乐而为是邪？热中于复辟以后之赐环<sup>②</sup>，而先为是齷齪不了之语，以耸

东胡群兽之听<sup>③</sup>，冀万一可以解免。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sup>④</sup>，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sup>⑤</sup>，自谓教主<sup>⑥</sup>，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sup>⑦</sup>，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蛊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吾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

.....

长素又曰：所谓奴隶者，若波兰之属于俄<sup>⑧</sup>，印度之属于英<sup>⑨</sup>，南洋之属于荷<sup>⑩</sup>，吕宋之属于西班牙<sup>⑪</sup>，人民但供租税，绝无政权，是则不能不愤求自立耳。若国朝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可以为宰相。自同治年来<sup>⑫</sup>，沈、李、翁、孙<sup>⑬</sup>，迭相柄政，曾、左及李<sup>⑭</sup>，倚为外相<sup>⑮</sup>，恭、醇二邸<sup>⑯</sup>，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荣禄、庆邸<sup>⑰</sup>外，何一非汉人为政？若夫政治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然且举明世廷杖、镇监、大户加税、开矿之酷政而尽除之<sup>⑱</sup>。圣祖立一条鞭法<sup>⑲</sup>，纳丁于地，永复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他日移变<sup>⑳</sup>，吾四万万人必有政权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

夫所谓奴隶者，岂徒以形式言邪？曾、左诸将，倚畀虽重，位在藩镇，蕞尔弹丸<sup>㉑</sup>，未参内政。且福康安一破台湾，而遂有贝子郡王之赏<sup>㉒</sup>；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满洲<sup>㉓</sup>；爵不过通侯<sup>㉔</sup>，位不过虚名之内阁；曾氏在日，犹必谄事官文<sup>㉕</sup>，始得保全首领。较其轻重，计其利害，岂可同日而道！近世军机首领<sup>㉖</sup>，必在宗藩<sup>㉗</sup>。夫大君无为，而百度自治；为首领者，亦以众员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孙之有事，乃适见此为奴隶而彼为主人也。阶位虽高，犹之阉宦仆竖而赐爵仪同者<sup>㉘</sup>，彼固仰承风旨云尔，曷能独行其意哉！

一条鞭法，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羨<sup>②</sup>、平余<sup>③</sup>，犹在正供之外<sup>④</sup>。徭役既免，民无恶声，而舟车工匠遇事未尝获免。彼既以南米供给驻防<sup>⑤</sup>，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借美名以媚悦之。玄烨、弘历<sup>⑥</sup>，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sup>⑦</sup>。已居尧、舜、汤、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其酷有甚于加税开矿者。观唐甄之《潜书》与袁枚之《致黄廷桂书》<sup>⑧</sup>，则可知矣！庄生有云：狙公赋茅，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sup>⑨</sup>。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此正满洲行政之实相也。

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sup>⑩</sup>，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sup>⑪</sup>，嗣庭之狱<sup>⑫</sup>，景祺之狱<sup>⑬</sup>，周华之狱<sup>⑭</sup>，中藻之狱<sup>⑮</sup>，锡侯之狱<sup>⑯</sup>，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sup>⑰</sup>，犹一切被繙貫木以挫辱之<sup>⑱</sup>。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sup>⑲</sup>

夫长素所以不认奴隶，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尔。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举其诏旨，有云“一夫失职，自以为罪”者，而谓“亟亟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视天位如敝屣”。然后可以言皇帝复辟而宪政必无不实行之虑。则吾向者为《正仇满论》既驳之矣<sup>⑳</sup>。盖自乙未以后<sup>㉑</sup>，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湉小丑<sup>㉒</sup>，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sup>㉓</sup>，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sup>㉔</sup>，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sup>㉕</sup>，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

也。曩令制度未定<sup>①</sup>，太后夭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sup>②</sup>，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非直堕坏，长素所谓“拿破仑第三新为民主<sup>③</sup>，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sup>④</sup>，擒议员百数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者，又将见诸今日。何也？

今以满州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也<sup>⑤</sup>。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sup>⑥</sup>，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邪？藉曰其出于至公<sup>⑦</sup>，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休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sup>⑧</sup>，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sup>⑨</sup>。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sup>⑩</sup>，虽无荣禄<sup>⑪</sup>，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

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昵近之地群相讐讟<sup>⑫</sup>，朋疑众难，杂沓而至。自非雄杰独断如俄之大彼得者<sup>⑬</sup>，固弗能胜是也。共、疆四子<sup>⑭</sup>，于尧皆葭莩姻娅也<sup>⑮</sup>，靖言庸回<sup>⑯</sup>，而尧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邪？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大彼得者邪？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sup>⑰</sup>，独驻防则不敢撤<sup>⑱</sup>。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长素徒以诏旨美谈视为实事，以此诳耀天下。独不读刘知几《载文》之篇乎<sup>⑲</sup>？谓魏、晋以后，诏敕皆责成群下，藻饰既工，事无不可，故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sup>⑳</sup>，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sup>㉑</sup>。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虚实矣。

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邪？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sup>⑩</sup>；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sup>⑪</sup>。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sup>⑫</sup>。使东三省尚在，而满洲大长，得以兼统汉人，吾民犹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满洲故土，既攘夺于俄人<sup>⑬</sup>，失地当诛，并不认为满洲君主，而何双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sup>⑭</sup>，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诚如是，则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蠹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

虽然，如右所言，大抵关于种类，而于情伪得失未暇论也。则将复陈斯旨，为吾汉族筹之，可乎？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旗变也<sup>⑮</sup>？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sup>⑯</sup>，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sup>⑰</sup>，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阅普通武之请立宪<sup>⑱</sup>，天下尽笑其愚。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长素虽与载湉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拴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sup>⑲</sup>。载湉

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水以为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长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sup>①</sup>，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sup>②</sup>，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辨<sup>③</sup>，甚至章京受戮<sup>④</sup>，己亦幽废于瀛台也？人君者，善恶自专，其威大矣。虽以文母之抑制<sup>⑤</sup>，佞人之谗嫉，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嫪毐、不韦而踣覆之<sup>⑥</sup>，今载湉何以不能也？幽废之时，犹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sup>⑦</sup>，日在道涂，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而处。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则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之俦耳<sup>⑧</sup>。太史公曰：“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sup>⑨</sup>。”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无实权，不得以成败论之，而皇帝则不得不以成败论之。何者？有实权而不能用，则不得窃皇帝之虚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与天下共忧；督抚之不能制，而欲其使万姓守法，庸有几乎！

事既无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验已众箸于天下矣。长素则为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征。呜呼！王莽渐台之语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sup>⑩</sup>？”今之载湉，何幸有长素以代为王莽也。必若图录有征<sup>⑪</sup>，符命可信<sup>⑫</sup>，则吾亦尝略读纬书矣<sup>⑬</sup>。纬书尚繁，《中庸》一篇<sup>⑭</sup>，固为赞圣之颂。往时魏源、宋翔凤辈<sup>⑮</sup>，皆尝附之三统三世，谓可以前知未来。虽长素亦或竺信者也<sup>⑯</sup>。然而《中庸》以“天命”始<sup>⑰</sup>，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sup>⑱</sup>。“天命”者，满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载”者，载湉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则建夷之运<sup>⑲</sup>，终于光绪，奴儿哈赤之祚，尽于二百八十八年。语虽无稽，其彰明较箸，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

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何者？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虽然，载湉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绌矣。而谓革命党中央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而长素徒以阿坤鸦度一蹶不振相校<sup>⑩</sup>。今天下四万万人之材性，长素岂尝为其九品中正<sup>⑪</sup>，而一切检察差第之乎，借口此魁梧绝特之彦，非中国今日所能有，尧、舜固中国人矣。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

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稽，校较无已<sup>⑫</sup>，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

且勿举华、拿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sup>⑬</sup>。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sup>⑭</sup>。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则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sup>⑮</sup>，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

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sup>⑩</sup>，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sup>⑪</sup>，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删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时<sup>⑫</sup>，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sup>⑬</sup>，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豫言也。

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sup>⑭</sup>，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长素以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或请外国练军，或与外国立约，或向外国乞师”；“卒之堂堂大国，谁肯与乱党结盟？可取则取之耳。”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sup>⑮</sup>，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尝通情于大将军，欲为代平内乱，大将军之从之与否，此固非覆幕党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则从之为多数，而不从为少数，幸而不从，是亦覆幕党所不料也。而当其歃血举义之时，固未尝以其必从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复<sup>⑯</sup>，略有萌芽，而长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乎？呜呼！生二十世纪难，知种界难<sup>⑰</sup>，新学发见难，直人心奋厉时难。前世圣哲，或不遇时；今我国民，幸睹精色<sup>⑱</sup>。哀哀汉种，系此刹那，谁无父母，谁无心肝，何其夭阏之不遗余力<sup>⑲</sup>，幸同种之为奴隶，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运械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数省，外稍负海而内有险阻之形势，可以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尝无其地也。略得数道<sup>⑳</sup>，为之建